

【近代文学】

清末民初汉语文言与白话“二言”现象论

高 玉

【摘 要】清末民初汉语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两种语言通行,文言文处于主体地位,白话则越来越成熟,在文言与白话之间则有很多中间形态比如半文半白、浅近文言文,即“近代汉语”。语言是思想的深层基础,文言文特别适合表达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国语”表达现代思想则准确而有效,清末民初汉语“二言”现象是近代思想文化活跃的表象也是原因。在思想的层面上,近代汉语及其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思想文化在宋之后的状况和发展变化。汉语在清末民初时期越来越趋向以白话为主以文言为辅的局面,并最终发生转型即从古代汉语转型为现代汉语。清末民初汉语在构成上非常复杂,白话与文言共生,既矛盾冲突又和谐互补,表面上“混乱”,其实是多元、包容、张力、丰富、复杂、生机以及多种可能性的表现,“混乱”其实是这一时期社会上思想文化活跃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清末民初;文言;白话;近代汉语

【作者简介】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原文出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23.5.114~1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语言变革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16ZDA190)。

在中国史研究中,清末民初阶段是显学,具有很高的“学科”地位,但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中,清末民初阶段则是边缘领域。一方面,清末民初文学不是纯正的古代文学,它偏离了古代文学,可以看作古代文学的一个“尾巴”;另一方面,清末民初文学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和纯正的古代文学相比,它有了新质,语言上白话越来越多,但它又不是“新文学”,最多算是“新文学”的“前奏”或“先声”,所以现代文学研究界主要是在新文学的“发生”或“起源”的意义上研究它。语言上,清末民初的汉语非常复杂,既有纯正的古文,但更多的则是浅近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的汉语,近代汉语既不是标准的古代汉语,也不是标准的现代汉语。

清末民初的汉语具有“二言”性,文言与白话共生,而在文言文和白话文两极之间又有多种汉语形态比如浅近文言文等,清末民初的汉语包含着古今中外各种语言因素,生机勃勃,这是一种优胜的语言

机制,也是一种优胜的思想文化机制,没有这个“杂糅”的语言阶段,就不可能产生后来的“国语”。本文主要对清末民初文言白话“二言”现象进行归纳分析,并对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学意义进行重新研究。

一、文言文的主体地位

“二言”这个概念是笔者从王力处借用来的。王力认为古人是使用两种语言的:“古代人学习古文,不但读的是文言文,而且连写的都是文言文。他们对家里人说的是一种话,关在书房里说的是另一种话,他对古人说古人话,甚至还对朋友说古人话,慢慢地训练成为能说两种话的人,就成为语言学中所谓二言人。”^①理论上,汉语最初只有一种形式即口语,但慢慢一分为二即书面语与口语。事实上,汉语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别,我们把《论语》和同时期的汉语经典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论语》是语录体著作,虽然孔子门人整理时进行了加工和改造,但仍然保留了一些口语,包括词语、句

式、语气等,也可见当时的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微妙差异。汉语的变化规律是:书面语保持相对稳定,而口语则变化比较快,虽然书面语也会适当吸收口语词语,但总体上是口语与书面语差距越来越大,以致到了清末民初时,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出现了矛盾与冲突,最后发生了白话文运动,进而演化成新文化运动并最终建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社会类型。所以,语言“二言”现象不仅存在于个人,也存在于社会,汉语的“二言”分离在清末民初达到了顶峰。

有各种各样的“二言”,从大的方面即整个社会语言状况来说,清末民初的“二言”是文言与白话两种语言并立,但从标准的文言文到民间方言俚语的白话口语之间有许多过渡形态,所以清末民初社会语言的“二言”又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形,其中,文言处于主体地位。

清末民初标准的汉语是文言文,又可以区分为“选学”传统与“桐城”传统,前者以南朝梁萧统主持编选的《昭明文选》为标准 and 范本,晚近则以明前后“七子”为代表;后者以清代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所创立的“桐城派”文学为标准 and 范本,远则可以追溯到《史记》、唐宋八大家、明“公安派”和“竟陵派”等。五四时钱玄同把这两大派古文概括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②,这当然是站在白话文的立场上而言,但当时的古文的确以“选学”和“桐城”为源。事实上,当时正统的知识分子其正规写作都是用文言文,只不过其“选学”传统与“桐城”传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罢了。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2-1921)、薛福成(1838-1894)、蔡元培(1868-1940)、黄遵宪(1848-1905)、刘师培(1884-1919)、严复(1854-1921)、林纾(1852-1924)、曾国荃(1824-1890)、李鸿章(1823-1901)、袁世凯(1859-1916)、罗振玉(1866-1940)、张之洞(1837-1909)、吴汝伦(1840-1903)、廖平(1852-1932)、章太炎(1869-1936)、熊十力(1885-1968)、黄侃(1886-1935)等都是用标准的文言

进行写作,后来的新文学反对者如“学衡派”的梅光迪(1890-1945)、吴宓(1894-1978)、胡先骕(1895-1968)以及比较接近学衡派观点的章士钊(1881-1973)等则是用浅近文言进行写作。

在文体上,文言写作主要集中在学术论著、奏议、批文、书信、日记、序跋、哀祭文、杂记、典志、家谱、小说、翻译等文体。比如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共31册,内容包括“奏稿”“批牍”“诗文”“读书录”“日记”“家书”“书信”等。理论上,“批牍”应该简明为好,正如新闻稿不宜过于使用书面语,讲话稿不宜太书面化一样,批牍也应该用白话,或者浅近文言,但曾国藩的批牍却是非常书面化的,是标准的文言,比如第一篇:“远贼必有近窝。清查户口,团练保甲,此为治盗第一要法。惟保甲之法不经书役之手,必须责成绅耆办理,当切商访绅耆中之公正而肯任事者,令其认真举行一二处,行之有效,则他处皆取则矣。快役以获盗之多寡定功过,亦有流弊。若非实指某处某贼,令其前往擒拿,泛泛海捕,恐有诬拿平民之患,不可不慎。”^③其语言虽然和“奏章”略有差异,相对浅近,运用了“远贼必有近窝”这样的通俗之语,但总体上属于标准的文言文。家信是写给家人的信,本可以比较随意,可以多用口语。白话更通俗易懂,更容易让家人明白,但曾国藩的家书也是标准的文言文,比如1862年《致澄弟沅弟》开头是这样的:“澄、沅弟左右:初八日彭芳四回家送菲仪于亲族,付去一函,不知何日可到。日内此间平安,余身体粗健。眩晕、疝气诸症未发,脚肿因穿洋袜而消,幸未再发,惟眼蒙日甚,无术挽回。”^④相比于曾国藩的文章来说,这已经很通俗浅显了,但仍然是标准的文言文。

袁世凯的语言也是标准的文言,不仅专著、书信、奏折等是如此,批示以及指令等也是如此,比如《准冯国璋开去参谋总长令》:“政事堂奉申令:据江苏宣武上将军参谋总长冯国璋奏称江苏地方重要,未能兼顾,请开去参谋总长俾专责成等情。该上将

军公忠体国,所请出于至诚,应即允如所请。冯国璋著开去参谋总长,仍督理江苏军务。此令。中华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三日。”^⑤免去冯国璋参谋总长职务,让其专心管理江苏军务,这用白话表达非常简单,但袁世凯的文言表达则繁文缛节,颇费周折,是比较典型的“官样”文章。

与曾国藩、袁世凯等人在思想上非常传统不一样,王国维受西方思想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在哲学上深受叔本华、康德的影响,这在他的教育学、哲学、美学以及文学研究上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语言上就表现为使用西方思想文化概念,但王国维的语言总体上是纯正文言文,比如1905年出版的《静安文集》“自序”这样说:“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意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后渐觉其有矛盾之处。”^⑥这里,“哲学”“批评”“知识论”“矛盾”等都属于西方概念,这段话除了可以一定程度上看出王国维思想的来源以外,也可以看出王国维的语言特色,言说完全是文言文的,只是使用了新术语、新名词而已,如果说读者对这一段话有陌生感,不是语言上的,而是思想上的。而在考古学、历史研究方面,王国维的文言表达更为纯正和古雅,比如《毛公鼎铭考释》一文开头是这样的:“三代重器存于今日者,器以孟鼎、克鼎为最巨,文以毛公鼎为最多。此三器者皆出于道、咸之后,而毛公鼎首归潍县陈氏,其打本、摹本亦最先出。一时学者竞相考释。嘉兴徐籀庄明经同柏、海丰吴子苾阁学式芬、瑞安孙仲容比部诒让、吴县吴清卿中丞大徵先后有作。明经首释是器有凿空之功,阁学矜慎,比部闳通,中丞于古文字尤有县解。”^⑦此文写于1916年,虽然这时白话文在中国已经广泛通行,但王国维仍然坚守文言文,“三代”“打本”

“摹本”“考释”“明经”“阁学”“比部”“中丞”“凿空”“矜慎”“闳通”“县解”等都是中国古代概念或术语,其对人物的称呼也是非常标准的文言文表达,“瑞安孙仲容比部诒让”,即浙江瑞安的孙诒让,字仲容,“比部”为刑部的官名,如果对中国古代文化不熟悉,很难读懂这段文字。

王国维的语言不仅在文章和学术研究上是典雅的文言文,即使上课讲义也是典雅的文言文,比如《教育学》一书,这是1904年王国维在江苏师范学堂执教时的讲义,理论上应该用“语录体”来写作更恰当,但王国维却是用标准文言写作,比如开头一段话是这样的:“‘教育’之语,虽今日一般用之,然精密考察其意义者殆稀也。世人或以教育但限于授算、读、写作之知识、技能,而学校但为授教科之地者,或以教育为但于学校施之者,皆不知教育之真义者也。教育真正之解释如左。”^⑧教育虽然自古就有,但王国维所说的教育学则属于西方的科学,今天一般人对这些内容非常熟悉,所以阅读没有什么障碍,但其实是标准的文言文。只不过比较浅显而已。王国维的翻译也是用标准的文言文,比如译匈牙利斯坦因《中亚细亚探检谈》(译于1909年),开头文字是这样的:“予于今日之会,拟与诸君略述在中国塞下之事。所历之时如在梦中,所阅之境迥出意表。岁月不居,若前日事,姑举一二,足知其概。余数骑东行,绵历岁月。某日之晡,始抵长城之下。是时心中若有所感,因念此处人文之停顿,地力之枯竭,草草二千年若旦暮耳。平生今昔之思无逾是矣。”^⑨阅读起来给人的感觉是斯坦因就是一个中国古人。

严复是清末思想启蒙家、著名的翻译家,其翻译著作几乎每一种都产生了轰动效应,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极大地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思想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有意思的是,严复在思想上虽然是“新学”,但在语言上却非常传统,不论是讲学、创作还是翻译,都是标准的“桐城派”古文,比如1905年严复应上海青年会院请,讲西

方政治学,共八“会”(即“讲”),其中“第一会”的开头是这样的:“不佞近徇青年会骆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非敢谓能,但此所言,语语必皆有本,经西国名家所讨论,不敢逞臆为词,偏于一人政见。数会以后,诸公将见此是格物穷理实事求是之学,固无意见之偏,宗旨之谬也。”^⑩虽然是演讲稿,但却文质彬彬,非常正规。《天演论》是严复翻译的最有名的西学著作,但看翻译,我们感觉不到翻译味,倒感觉赫胥黎完全是用文言文表达的,是一个中国古代学究在说话和表达,且深得古文之精髓,比如“厄言二”开头的文字:“自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固发之矣。但古以谓天运循环,周而复始,今兹所见,于古为重规,后此复来,于今为叠矩。此则甚不然者也。”^⑪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在说话。

与严复齐名的翻译家、文学家林纾,一生主要以教书为生,但以翻译西方文学著名。林纾曾编《古文辞类纂选本》《重订中学国文课本》8册、《浅深递进国文读本》等古文读本和课本,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林纾古文的来源、根柢和喜好,也可以看出林纾古文的特点。林纾的语言可以说是正统的标准古文。《畏庐文集》是林纾自编文集,19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很能够反映林纾的语言特点,比如第一篇《析廉》,开头文字是这样的:“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尽官也。六计尚廉。汉法:吏坐赃者皆不得为吏。鄙意此特用以匡常人。若君子,律身固已廉矣,一日当官,忧君国之忧,不忧其身家之忧,宁静淡泊,斯名真廉。”^⑫可以看到,这是标准的文言文,风格上偏于古雅。

林纾的语言比较固定,始终如一,其文章语言与小说语言没有差别,其小说创作语言和小说翻译语

言没有差异。严复主要是翻译学术著作,其阅读对象主要为中上层知识分子;林纾主要是翻译文学作品,其阅读对象主要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理论上,外国文学作品应该用白话翻译更适合,也更有商业效果,至少应该用浅近文言文来翻译,但林纾却是用标准的文言文,比如《黑奴吁天录》开头文字是这样的:“美国硃脱沟省交春垂二月,犹阴寒逼人。时有二人对酌,帝无僮厮杂侍。此二人者,性情相貌大复不类。其一人狞丑,名曰海留,衣服华好,御金戒指一,镶以精钻,又佩一金表。状似素封,而谈吐鄙秽,近于伧荒。”^⑬“素封”是指无封邑却比封邑更富有的人,出自《史记·货殖列传》。“伧荒”也是用《宋书·杜骥传》典。这绝对不可能是史妥夫人的用词,其实说明了中国当时的语言状况,标准文言文还是通行语言。林纾的创作也是用标准的文言文,比如短篇小说《蛟水》开头是这样的:“余友陈君客建宁时,夏令淫雨兼旬,蛟水发矣。一夕,大雷雨,山水暴出,厥声汹汹。陈夜起,开楼窗下视,溪流已高丈许。黑云浸淫中,有物,目光闪闪然。侍者曰:‘蛟也。’”^⑭特别接近《聊斋志异》的语言,是正统的文言文。

为什么清末民初的学术、公文、书信等都用标准的文言文,知识分子以及官僚阶层都用标准的文言文?这实际上是传统的沿袭,正常的语言延传。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标准语”之说,但语言“体制”是存在的,那就是延续了上千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及语言标准。科举起于隋末,在考试内容上随时代而有很大的变化,隋唐以“试策”为重点,宋以后则多以“经义”、“诗赋”为主,明清时科举考试更加程式化,以“八股文”为主,辅以“试帖诗”。科举考试不管内容上如何变化,有一点是比较固定的,就是以儒家经典为范本,这种范本不仅是内容上的,也是语言上的,所以儒家经典就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语文课本”,中国古代“正统”的语文教育都是学习儒家经典,这样,不论是官方的正统语言还是知识分子实际所接受的正统语言都是文言文,这是知识分子都用标准

的文言文写作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正规语言是文言文,这是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以及语言体制决定的。

清末民初,虽然中国思想文化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但主体还是传统的,知识体系也是传统的,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文言文处于主体地位和正统地位,正是这种文言文的主体地位和正统地位保证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地位和正统地位。中国古代不只是封建思想,还有很多思想精华,比如仁、爱、善、孝、团结、友爱等,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等都有其合理性,它们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以及话语方式的基础上,用正统的文言文写作其实是这种正统思想延传的一种保障。文言文具有良好的品性比如诗性、复杂性、包容性、开放性等,清末民初汉语以文言文为主以白话为辅,抛开主次,这种由文言文和白话共同构成的“二言”机制其实是汉语的一种良好状况,正是这种语言状况保证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活跃与开放,中国思想文化能够在清末民初发生现代转型,与这种语言的张力有很大的关系。

二、近代汉语越来越趋向成为主流语言

清末民初汉语“二言”中的一“言”是古代汉语,另一“言”则是近代汉语,“古代汉语属于文言的系统,而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属于白话的系统”^⑤。但“白话系统”未必都是白话,“近代汉语”其构成非常复杂,其形态也并非单一,既包括作为口语的白话即古白话,也包括半文半白汉语,还包括浅近文言文,“近代汉语”可以说是统称,包括白话但不只是白话,具有文言与白话的“双重”性。国语是纯粹的白话形式,但从词语构成来说有文言文的因素和西方语言的因素,而近代汉语则是文言与白话的混合物,当这种混合物最后变成以白话为主体,以文言文和外国语言作为因素并形成内在统一时就产生了“国语”,所以近代汉语与“国语”具有亲密关系。没有近代汉语就没有后来的“国语”。

在清末民初,胡适等人把《水浒传》《三国演义》这种近代汉语称为白话,这种“白话”其实可以称为“古代白话”,其中有很多口语的成分,但用现代白话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一种半文半白的语言,也可以称之为浅近文言文,或者具有文言特点的白话,最明显的特点是文言句法,还有很多文言词语,有很多单字词也即字表达或字思维。近代汉语主要以敦煌变文、禅宗语录、宋儒语录如二程语录和朱子语录等、《元代白话碑》、话本、南戏、北曲、明清小说为代表。明清小说除了比较早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外,还有晚近的《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等。在近代汉语中,文言与白话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本身就具有“二言”性,有的作品白话比较充分,偶尔用一些文言词语;有的作品文白相间,即半文半白;有的作品则是文言中偶用白话。

近代汉语从唐末就开始了,只是近代汉语在开始时其白话属性还比较微弱,所以今天学术界对于近代汉语究竟起于何时有很大的争论,有人说六朝就开始了,有人说宋末才开始,原因是元以前的近代汉语其白话不是很充分,因而近代汉语作为半文半白的语言其特征不明显。元以后,近代汉语的白话成分越来越多,近代汉语越来越趋于向白话发展,中国社会的文言与白话“二言”性也越来越突出,以至到了清末民初,近代汉语已经达到了基本上可以和古代汉语平分天下的地步,使用白话的人越来越多,使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清末民初文言文使用主要在政府机关和学术领域,在主流社会和上层社会,使用的人主要是正统的知识分子,而白话使用则主要在民间特别是中下层社会,在非学术领域比如文学领域,在新兴的领域比如科技领域、商业领域、新闻文化领域等,使用的人主要是非主流的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其年幼时接受的都是旧式教育,语言上都是文言文,但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沿着传统路径,走传统的老路,学术上固守经史子集,语言上也是严守文言;

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接受西方文化,学术上接受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因为文言文表达受限,这些人在语言上多使用近代汉语,中国社会的语言“二言”性更加分明。

英国人傅兰雅于1876年在上海创办《格致汇编》杂志,这是中国最早的科技期刊,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是浅近文言文,有些文章是以文言为主适当加入白话,但绝大多数是半文半白,是标准的近代汉语。比如《汽机要说》开头的文字:“西国近来所设有益之新法,内莫大于汽机。前有用人力者,有用牛马之力者,有用风力水力者,然皆不足以作大事。盖人力与牛马之力,均易疲乏而尽,苟作大事,必须增添人数,或牛马之数,岂不费浩而事繁?若凭风力或水力,则风有停息,或变方向,或忽大忽小等时,致必误事。用水力,则水有干涸之时,或泛滥汪洋,且水性趋下,有若干事不便于用,惟汽力则不然,风雨毫无相关,各处皆能适用,且其力可以历久不变。”^⑩虽然是文言句式,但多为通俗词语,语句也不复杂,有些书面化口语,却非常雅致。当然,这种雅化的语言可能与他的中文助手加工有关,也许傅兰雅最初的语言更口语化,是更纯正的白话。

清末民初,西方自然科学大量输入中国,产生了很多科技期刊,除了《格致汇编》以外还有《格致新报》《亚泉杂志》《理工》《科学世界》《地学杂志》《观象丛报》《电界》等。这些期刊的语言基本上是半文半白的近代汉语,比如《格致新报》,这是一种综合性杂志,刊登的文章不仅有自然科学,也有人文社会科学,其语言总体上是文白相间,比如爱莲室主人述意、乐在居侍者纂辞的《通语言为中国当务之急论》,其中基本上是这样的语言:“且各国之联合,也大半恃言语相通,非结盟可以永守者也。盖结盟不过为敌国战争计,烽烟迭警,干戈相扰,非特民不获太平,即国用亦所费甚大。总计泰西军兴以来,兵船枪炮之见毁者几何矣。太平之时,兵船枪炮之备而不用者,亦几何矣。则结盟无非暂时之利益,其不能世世

相守也明矣。试观意国常自分裂,而与法结盟,亨与奥亦常相背盟,其故皆由于恃权计而不以言语相通,故盟未久而变生不测也。”^⑪这里不仅有新的语言思想,言说上也是近代汉语,其白话的成分已经比较重了。

再比如《地学杂志》。这是清末迄现代非常有名、影响非常大的一种科技期刊,创办于1910年,一直到1937年才停刊。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开头的话是这样的:“中国地学,古有发明,以学者未列为专科,故后世卒鲜进步。今诸君子有志求学,设会研究,甚盛事也。鄙人过蒙不弃,特开会相招,俾陈说大旨,敢以一得之私,供献于诸君子之左右。窃谓今日研究地理学,须先明与地理关系最切之地质学。盖地理学上考察之山脉海洋及生物界之分布,为地理学中主要部分。而其生成及作用,莫不关系地质学。”^⑫这段文字中,凡科学问题皆为白话,而介绍性的中国化的内容则是标准的文言文。和林纾的很多翻译一样,这篇文章的翻译也是先经过口译然后再根据口译改写而成,也许白话口译更准确、更能够让人明白,但当时通行的语言还是文言,之所以要费力不讨好地把口语改为半文半白的近代汉语,一是雅化,二是“正规”化,这也说明了当时的语言状况:正统的语言是文言,但加入大量白话的近代汉语也非常通行。

不仅科技期刊是用近代汉语,当时大部分的人文杂志以及社会科学杂志也是用近代汉语,只不过有的杂志其语言更古雅,文言的成分比较重,而有的杂志则白话成分更重。比如《浙江潮》杂志,1903年创办于日本,鲁迅曾在上面发表《说钽》和《中国地质略论》两篇科学论文,用的均是文言,但并非严格的古文,明显是近代汉语。《浙江潮》上的文章其语言多为半文半白,比如《日本财政考》开头的文字:“银行者,国民全体信用之媒介及货币流通之机关也,其源肇于英国,全球滥觞,莫不师是。其重要处有二点:一受动业务即收贮存款并发行券是也;一加动业务即借金取息是也。”^⑬这是典型的近代汉语,

不过白话成分比重大。

《河南》杂志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创办,虽然主编“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⑩,但也明显是近代汉语,比如这样的文字:“何以言之?盖中国素所谓之亡国者,仅国家与国家之兴亡,而非平民与平民之兴亡。不惟无关乎兴亡,且于平民无丝毫之影响,受其祸者惟对待之国,对待国代表之人而已,于平民固无与也。故秦灭六国,惟六国消灭,而六国之平民仍自若也,何也?为六国之民亦平民,为秦国之民亦平民,其人格固未丧失,而未受特别之待遇故也。”^⑪虽然是论文,表达的是学术思想,但语言朴实,一般人都可以读懂。

其他政治思想文化杂志如《强学报》(1896年创刊)、《时务报》(1896年创刊)、《译书公会报》(1897年创刊)、《清议报》(1898年创刊)、《湘报》(1898年创刊)、《新民丛报》(1902年创刊)、《民报》(1905年创刊)、《国粹学报》(1905年创刊)、《国风报》(1910年创刊)、《庸言》(1912年创刊)等,其中都有半文半白的语言,只是白话与文言的比重略有差异而已。这种语言既与传统的标准的文言文不同,也与古白话小说等文学作品的白话不同,更与通俗性的、新闻性的“白话报”的白话不同,介于标准的文言文与口语白话之间,是比较典型的近代汉语。

《学衡》创办于1922年,是著名的保守派学术期刊,反对新文化运动,在语言上反对白话文“一统天下”的主流地位。但《学衡》创刊时“国语”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民国政府就是这一年下令中小学语言教育改用现代白话,“学衡派”虽然激烈地反对新文化运动,坚守文言文,但实际上,《学衡》作者中除了王国维、柳诒徵、刘永济等人的语言是比较标准的文言文以外,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学衡”诸君子所写文言文均非标准古文,而更接近于近代汉语,也即有白话的成分。比如《学衡》第一篇文章就非标准古文,开头的话是这样的:“吾国近今学术界,其最

显著之表征,曰渴慕新知,所求者多,所供者亦多,此就今日出版界可以见之。此种现象,与西洋文艺复兴相较,颇有相似之处,实改造吾国文化之权舆也。然其趋向新奇,或于新知之来,不加别择,贸然信之,又或剽窃新知,未经同化,即以问世,冀获名利,其他弊端,时有所闻。”^⑫这属于近代汉语,和林纾等人的标准古文有很大的差异。

《甲寅》杂志也是语言复古杂志,主编章士钊有写作标准古文的能力,但《甲寅》杂志上所发表的不论是章士钊的文章还是其他作者的文章(作者有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胡适、易白沙、吴稚晖、杨昌济等),都不是标准的文言文,而是近代汉语,只不过有的文章文言成分比较重而已。比如章士钊的《政本》一文,这是《甲寅》第1卷第1号的第一篇文章,开头的话是这样的:“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欲得是说,最宜将当今时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罗而剔抉之,如剥蕉然,剥至终层,将有见也。”^⑬虽然是文言句式,但词语上却是白话的。其他作者的文章则更偏向于白话,或者说白话的成分很重。

孙中山12岁之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西式教育,其语言相对比较白话化,这从《三民主义》等文章以及孙中山的各种演讲中看得非常清楚,孙中山的语言可以定位于近代汉语中的浅近文言文一类,也即《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程度的白话或文言。孙中山的书信以及“总统令”“大元帅令”等正规书信和通令都是如此,比如《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写于1894年,开头文字是这样的:“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⑭虽然较多使用文言词语,但总体上属于浅近文言文,一般人也可以读懂。再比如1912年《致〈字林西报〉等书面谈话》,开头的文字是这样的:“余所倡议者,系清帝一经退位,即辞职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而各省

都督暨临时内阁均极力反对。旋经余再三勤[劝]解,始允承认。于是吾辈即磋商最后办法。忽袁氏电称:‘南京临时政府应于清帝退位后二日内即行取消’。吾人以袁氏前既有可疑之状,今又有此举,莫不为之惊讶,决定不允照准。”^⑤此虽然名为“谈话”,但实则为书面表达,非常规范,是浅近文言文。孙中山一生的语言都是如此,晚年也没有大的变化,比如《致胡汉民廖仲恺函》:“汉民、仲恺两兄鉴:商人有愿筹北伐费而讨回枪械者,此事现交精交涉,如得完满结果,当要给回一大部与服从政府之商团。故欲沽其一大部分为练兵费一节,不可施行。此帮械如何发落,当俟精卫交涉后而定也。孙文。中华民国十三年九月六日。”^⑥1924年,国语已经形成并通行,孙中山还是用浅近文言文,可见近代汉语在国语建立之后并没有停止通行。恰恰相反,近代汉语在清末民初是非常通行的,孙中山等清末民初人物大多数仍然是用浅近的古文。胡适曾经说过:“国民党当国已近两年了,到了今日,我们还不得不读骈文的函电,古文的宣言,文言的日报,文言的法令……”^⑦可见当时的语言状况。

近代汉语走过了从以文言为主白话为辅到半文言半白话到以白话为主文言为辅的发展历程,当白话能够涵纳文言文,能够涵纳西方语言,完全成熟的时候,中国语言就发生了现代转型,就产生了可以广泛使用的通用的统一性的“国语”也即现代汉语。清末民初汉语是最为丰富复杂的,其中近代汉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代汉语从产生到变化发展,为国语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般人的印象中,国语似乎是胡适等人振臂一呼,提倡文学改良,提倡和进行白话文运动而发生的。文学改良运动、白话文运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没有自宋就开始的近代汉语,没有近代汉语在清末民初的迅速发展造成白话作为书面语的成熟,国语是不可能短时间内建构起来的。清末民初,白话成长为主流语言可以说是呼之欲出,新文学运动的“国语”运动不过是顺势

而为,是“量变”发展到成熟时期的“质变”。

古代口语白话主要是在日常层面上使用,且以语音为中心,使用范围受方言的限制,往往区域狭小,对思想文化影响非常小。而纯正文言文主要是表达正统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维护正统的思想,因此在文言文内部很难发生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近代汉语在语言上的包容性也即在思想上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撕开了文言文所维护的正统思想文化的口子,而对民间思想以及外来思想保持了开放性。近代汉语的包容性、内在张力其实是近代思想保持活跃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正是这种开放、张力和包容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包括语言本身的转型即汉语主体语言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

三、口语白话书面化并且日趋成熟

说起白话文运动,大众首先想起的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甚至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其实,晚清有一个同样广泛的白话文运动,只不过没有使用“白话文运动”这种表述而已。当然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晚清白话文运动主要是思想启蒙运动,也即借用白话传播各种思想包括传统思想,而五四白话文运动则是思想革命运动,其白话已经不是传统的白话,而是包含着新思想同时吸收传统思想文化精华的白话。晚清白话文运动为五四白话文运动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准备,为五四白话即国语的建立奠定了实践基础,也奠定了理论基础。

晚清白话文运动首先发生在大众文化领域,比如新闻、通俗文学、宗教等,其中最显著的现象就是产生了大量的白话报刊,“据不完全统计,1897-1918年间存世的白话报刊,总数在370种以上”^⑧。笔者认为,整个晚清特别是清末民初的白话写作尝试最大的贡献是对作为口语的白话如何书面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五四白话即“国语”建构做了很多先期准备工作。近代汉语主要是把白话融入文言文,根据融入的多少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而晚清白话写作

则不同,它最大的贡献是把口语书面化,很多口语是没有对应汉字或者汉字不确定的,口语书面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确定文字,其实是根据读音找字义最接近的汉字,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晚清白话文写作另一项工作就是改造作为口语的白话,把口语规范化,包括语法规则化、词语规范化,同时,把一些思想性的词语引入白话。思想性的词语既包括文言词语,也包括新词,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这恰恰就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所做的事情。文言文主要是“字思维”,单字词非常多,而白话则多为二字词,西方新名词多用二字词翻译,所以很容易融入白话,相反很难融入文言文。伴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以及科学技术广泛而深入的接受,白话也就越来越成熟,从而汉语的平衡被打破,主体语言开始向白话倾斜。

清末民初在语言上完全使用口语化的白话的则是新闻报纸。清末产生了一批白话报,其中影响非常大的有《无锡白话报》《京话日报》《京话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福建白话报》《直隶白话报》《吉林白话报》《广东白话报》《安徽白话报》《卫生白话报》《天津白话报》《长沙地方自治白话报》《宪政白话报》《回文白话报》《爱国白话报》《白话捷报》《白话强国报》《北京白话报》《事实白话报》《公教白话报》《教育实业白话报》《白话晨报》等,这些报纸的白话除了“官话”以外,很多都是方言,就通俗性来说,它比今天的现代汉语更口语化,更直白和浅显。举例如下:

《无锡白话报》由裘廷梁于1898年创刊,主要是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其中开篇文章题为《变法取士》,开头文字是这样的:“近来中国,皇上渐渐觉得八股出身的举人进士,都是没有实用的。现在时势艰难,民穷财尽,没有一年不受外国的欺侮,若要靠这些做八股人,替国家出力,真是休想,若决计废了这八股,另考别种,又恐天下的读书人,一时也改变不及,因此和宰相大员,商议多时,想出一个极好的法子,在

考试八股外,另开一科,名叫‘经济科’,本年正月初七日,已下了一道圣旨,晓谕天下的读书人。”^②这是当时的“官话”,即白话的普通话,是口语的书面化,但不完全是口语,其中,“时势艰难”“民穷财尽”“另”“别”“恐”等都是书面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虽然没有标点符号,但全文用空格表示断句,所以阅读上没有任何障碍。

《京话报》创办于1901年,其中“发刊词”《论创办这〈京话报〉的缘故》一文是清末民初白话运动的重要理论文献,开头的文字是这样的:“试问咱们中国,四万万万人,这里头,那一个不是咱们大清国的百姓。既作了咱们大清国的百姓,可就要知道这‘忠君爱国’的四个字怎么讲。你们大家伙想想,咱们太后同皇上,现在到了陕西,吃也没(读作‘灭’)有好的,穿也没有好的,为了这些百姓,惹下这么大的乱子,带累他们母子二位,吃了多少的苦,呕了多少的气。还(读作‘孩’)要替人家赔钱赔礼。你们到底知道不知道这是谁的不是咧?”^③全文有句逗断句。这是非常标准的口语,是典型的口语书面化的白话。

《广东白话报》创刊于1907年,除了“发刊词”以外,全部用广东方言写作,比如第1期第1篇文章《解明官场现形图》,开头是这样的:“哈哈,有个咁嘅野窝,哈哈,有个咁嘅古怪野窝,你估呢个系乜野呢,系官嚟播,系满清嘅官嚟播。点解佢粒顶红色呢,系染红嘅,系俾人血染红嘅。点解佢双耳有条柄呢?系木枳嚟,佢因为做得唔好,怕人闹佢,所以俾两个木枳塞住,就唔听见人地闹喇。点解佢带咁多重眼镜呢,佢因系有眼睛,所以带多几重眼镜遮住,等人地睇唔出佢有眼睛啫。”^④内容是对一幅漫画的评说,完全是用粤语口语表达,有句逗断句,但不懂广东话的读者,基本上不懂其义,作为白话书面化的尝试,这是以语音为核心,而不是以文字及表意为核心。这不是白话文发展的方向,但反映了清末民初白话书面化的多元状况。

清末民初的文学语言以白话居多,一方面是延

续《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儿女英雄传》等古代白话小说传统,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社会更加商业化,文学读者层级下移,文学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因而在语言上更加白话化,在形式上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白话,这一点从当时非常通行的小说杂志如《新小说》(1902年创刊)、《绣像小说》(1903年创刊)、《新新小说》(1904年创刊)、《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小说林》(1907年创刊)、《礼拜六》(1914年创刊)等刊载的小说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⑧。比如《新小说》第一期《东欧女豪杰》开头文字是这样的:“看官,古语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两句话谅来大家都是听惯的。但据我想来,凭他怎么样一个英雄,那有多大本事造得出时势来,近人说得好,一定先有那造出‘造时势之英雄’的时势,这些英雄们才能够跟著造去,这话真是一点不错,你看古来所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桩是靠着一个英雄便做出来?一定有许多大的小的有名的无名的种种英雄,你帮我衬,这才成得一件事。”^⑨再比如《月月小说》第一号《上海之秘密》开头的文字是这样的:“大凡极热闹的市场,都有些奇奇怪怪,想不到的事儿,没人调查就如云散天空,水归大壑,无影无踪了。做小说的人,偏不肯放他过去,把来一件件的写上。看官听真,你们看了我这部小说,就如亲到了这热闹市场一般,而且这些事儿,隐密的很,就是住在这市场上的人,也不能尽都知道的。”^⑩与上面标明为“白话报”报纸相比,文学期刊的白话明显更书面化,清末民初各种“白话报”主要是以新闻、时事和政论为主,读者多为中下层民众,作者多为记者和编辑,所以语言上虽然是书面语,但口语化很重,也可以说是“迁就”口语,所以,这种语言虽然通俗易懂,但比较粗鄙,又因为方言俚语比较多,也难通行,这也非“国语”的发展方向,但它为国语建构积累了经验,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清末民初通俗文学杂志中的白话文学语言则不同,读者多为中上层民众,作者多为作家,主要是刊登有一定思想、文化、社会、历史价值的文学作品,大多为小说,虽然语言上极力通俗,大量使用口语甚至方

言,但总体上直接借用近代汉语中通俗易懂的词语比较多,上述两段引文中“惊天动地”“你帮我衬”“云散天空”“水归大壑”“无影无踪”等就非口语。这些词语日常生活交流中偶尔也会使用,但明显属于“雅语”,所以清末民初白话文学期刊上的白话不是纯粹口语的白话,更“迁就”书面语,语言品质比较高,可以通行,这恰恰是后来即五四时期“国语”建构的路径,也即胡适所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语言是较好的语言,不仅规范,而且诗性化,表达丰富,在这一意义上,清末民初白话文学对于后来的国语建设意义重大。

事实上,即使是白话报上刊登的文学作品,其语言和新闻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京话日报》上有小说连载,其中《达威德尔侦探记》第一节开头是这样的:“却说英国有个达威德尔,是英国本岛的人。自幼学习外交的学问,能通各国语言文字(各国的外交官,没有一个不通外国语,识外国文的,多的三四国,少的也一两国,要像中国的钦差参赞,只要托人情,不必论学问,是地球上所没有的),并考究各国的地理险要,留心各国的外交政策,总以保全本国的权利名誉为主,他的识见既是远大,并且有天赋的一种奇才,能随机应变,考查一切疑难的事情。”^⑪可以看到,它和《京话日报》上广告、新闻、告示、讲书、演讲等的语言都有很大的区别,一是专业,二是多借用古汉语中通俗词语,比如“外交”“学问”“语言文字”“外国语”“外国文”“钦差”“参赞”“地理”“政策”“权利”“识见”“远大”“天赋”“随机应变”等都非口语,而是书面语,所以和新闻语言的口语化不同,它非常书面化,也是雅化。这种语言已经和后来的“国语”非常接近了。

1895年,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发起“时新小说”征文活动,征集到了162份稿件,这些稿件后来被傅兰雅带到美国,近年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这些小说的语言更能够反映当时普通小知识分子的语言状况,更能够反映当时下层文学的语言特征,比如获得第二名的小说《澹轩闲话》,开头是这样

的：“话说广东广州府香山县，有一位极有名望的绅士，姓包名得仁，字尚德，娶妻周氏，年纪五十余岁，尚无子嗣，却自幼读书，高才博学，真是一个读破万卷书的通儒，在读书人中，没有一个人不敬服他的。”^⑧这和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的标准古文完全不一样，和孙中山、宋教仁等人浅近文言完全不一样，和《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代白话也不一样，已经是非常口语化的白话了，和《儿女英雄传》的语言非常接近，和《新小说》《绣像小说》等文学期刊上的白话小说的语言比较接近，文言的成分已经变得很少。

中国叙事文学自明开始在语言上就追求通俗，使用白话，而清末民初的文学语言更加通俗化，非常接近后来的白话了。与思想文化期刊相比，文学期刊在语言上一开始就白话化，这与其读者对象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其表达的故事、情感等日常内容有关。学术期刊的读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良好的文言文训练，他们愿意读文言文章，也更习惯文言表达，而文学读者多为普通读者，他们的识字读书虽然也是以文言为范本，但文言阅读和写作水平都非常有限，所以他们更愿意阅读白话成分很高的近代汉语。同时，思想和学术主要是陈述历史事实，表述思想，文言的术语、概念与范畴更便捷有效，而文学作品主要叙述描写人的情感以及日常生活，白话表达更方便和准确，这是文学更多地用近代汉语的原因。中国近代最早的文学期刊是《瀛寰琐纪》，创办于1872年，其语言和同时期的思想文化杂志明显不同，属于近代汉语，比如这样的话：“凡物皆有知觉，皆能运动，则亦各具性情也。故鸟兽之中有静有躁，有动有止，观其振翼敛翮则可知其避缯缴慕树林之志趣矣。观其奋蹄摇尾，则可知其喜群友习跳跃之情状矣。独至于海族之繁多，鳞介之丑类，则为人所不习，不习则无以审其志趣，察其情状。”^⑨虽然不是情状描述，更多是抽象地说理，但没有生僻的字词，语言平实易懂，和标准的文言文有很大的差别。

199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分12个专集共30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文学的语言差异

是非常大的，首先与作者有关，比如胡适的语言以白话为主，而章太炎的语言则比较标准的古雅的古言。近代文学的语言差异也与文体有关，相比而言，文艺理论的语言、书信的语言比较趋向于正统而且规范的古言，小说、俗文学、翻译文学的语言则多白话，且有的作品的语言已经接近口语的白话，文言成分很少。比如《禽海石》的开头是这样的：“看官，不瞒你说，我现在病到这般地步，我是搦定厌世主义，不想活在世上的人了。我的脑筋一转，我就看见我那最心爱、最知己的意中人，一张鹅蛋脸儿，两道高高的眉毛，一双秋水盈盈的媚眼，一张樱桃小口，两边颊上还有两个酒涡儿，立在我的面前，忽嗔忽喜，忽笑忽悲，弄得我神魂颠倒，终日昏昏的如醉梦一般。”^⑩这里，除了少量的如“搦定”“厌世”“嗔”比较文雅以外，其他词都通俗易懂，但也并非口语，没有方言俚语。再比如吴棹译德国作家苏德蒙的《卖国奴》一书，基本上是白话，第一章开头：“话说西历一千八百十四年间，其时正是欧洲有名豪杰拿破仑皇帝威风扫地之际。他放出惊天动地手段，要夺取法兰西的君位，无奈各国群起而攻，不能如愿，不得已，大家会议，才结了平和条约。”^⑪除了少量名称如“会议”（即“商议”）、“平和”（即“和平”）和今天略有差异以外，整个语言和今天的现代汉语没有什么差别，读起来没有任何语感上的陌生。

结语

清末民初的汉语其实是文言与白话的“二言”状，白话与文言的比重因个人、领域和载体等不同而各异，总体上是文言文占主导地位，白话占辅助地位，但后续发展则是白话呈上升趋势，其地位越来越高，文言则相反。清末民初的白话和五四时期的白话即“国语”有本质的区别，清末白话不是为了取代文言文，而是为了补充文言文，传统的思想用文言更容易表达也能够表达得更准确，但现代思想，用白话表达更准确和方便。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巨变之中，新旧思想纷呈，再加上形式丰富多样，所以各种语言都有市场。清末民初是汉语最复杂最丰富多样

的时期,也反映了时代的巨变之过程。清末民初汉语向何处去其实有多种可能性,“国语”即现代汉语只是其中一种,有其合理性,但未必是唯一选择和最佳选择。

清末民初的汉语是中国语言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状态,表面上混乱,其实是汉语的黄金时代,“混乱”其实意味着自由、包容、多元、活跃、张力和多种可能性,没有这种“混乱”就没有后来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假如清末民初还是只有文言文一种语言,如果文言文排斥白话,打压白话,铁桶式地维护文言文的统治地位,汉语的转型以及整个中国社会和思想的转型就不可能发生。所以清末民初汉语表面复杂混乱,恰恰是汉语的丰富繁荣并潜藏着思想文化的多种可能性,正是这种丰富的语言以及表达思想文化的多种可能性导致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巨变也即“转型”。汉语在近代的丰富复杂对于近代思想文化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其对今天的汉语建设以及相应的思想文化建设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特别是文言与白话两种语言彼时如何相安无事地使用,如何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对于我们今天的语言建设特别是文言文写作的可能性及其方式应该是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注释:

①王力:《怎样学习古代汉语》,《龙虫并雕斋文集补编(三)》,见《王力全集》(第20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945页。

②钱玄同:《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③曾国藩:《批安福禀到任日期并查明地方现在安静容俟体察情形办理保甲团练以靖盗风由》,见《曾国藩全集》(第13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页。

④曾国藩:《致澄弟沅弟》,见《曾国藩全集》(第2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576页。

⑤袁世凯:《准冯国璋开去参谋总长令》,见《袁世凯全集》(第35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⑥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见《王国维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⑦王国维:《毛公鼎铭考释》,见《王国维全集》(第1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85页。

⑧王国维:《教育学》,见《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159页。

⑨王国维:《观堂译稿》,见《王国维全集》(第19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31页。

⑩严复:《政治讲义》,见《严复全集》(第6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页。

⑪严复:《治功天演论(手稿本)》,见《严复全集》(第1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⑫林纾:《畏庐文集》,见《林纾集》(第1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页。

⑬林纾:《黑奴吁天录》,见《林纾翻译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第1页。

⑭林纾:《蛟水》,见《林纾集》(第3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19页。

⑮江蓝生:《古代白话说略》,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年,第8页。

⑯傅兰雅编译:《汽机要说》,《格致汇编》(第2卷)(1876年2月),见《格致汇编(李俨藏本)》(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0页。

⑰爱莲室主人述意、乐在居侍者纂辞:《通语言为中国当务之急论》,《格致新报》(第2册)(1898年3月),见《中国早期科技期刊汇编》(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第464页。

⑱德瑞克:《论地质之构成与地表之变动》,王世英口译,耿兆栋笔述:《地学杂志》“第1年第1号”(1910年正月),见《中国早期科技期刊汇编》(第4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第17页。

⑲二十世纪男子:《日本财政考》,《浙江潮》1903年第1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第1页。

⑳鲁迅:《〈坟〉题记》,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㉑鸿飞:《平民的国家》,《河南》1907年第1期。

㉒刘伯明:《学者之精神》,《学衡》1922年第1期。

㉓秋桐:《政本》,《甲寅杂志》第1卷第1号,1914年5月10日。

㉔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页。

㉕孙中山:《致〈字林西报〉等书面谈话》,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41页。

㉖孙中山:《致胡汉民廖仲恺函》,见《孙中山全集》(第11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2-23页。

②⑦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79页。

②⑧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②⑨锡麓菜傭滨:《变法取士》,《无锡白话报》第1期(1898年5月11日),见《无锡文库》,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③⑩《论创办这〈京话报〉的缘故》,《京话报》第1回(即“期”),见《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年,第7页。

③⑪亚拙:《解明官场现形图》,《广东白话报》第1期,见《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第7册),第8页。

③⑫参见高玉:《论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的传承与新变》,《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

③⑬岭南羽衣女士著,谈虎客批:《东欧女豪杰》,《新小说》

第1号(1902年11月),第33页。

③⑭讷夫:《上海之秘密》,《月月小说》第1号(1906年11月),第163页。

③⑮《达威德侦探记》,《京话日报》第2号(1904年8月17日),《京话日报》(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第9页。

③⑯詹万云:《澹轩闲话》,见《清末时兴小说集》(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3页。此篇获得第二名,其中第一名文稿已佚。

③⑰小吉罗庵主初稿:《鱼乐国记》,见《瀛寰琐纪三种》(第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3年,第25页。

③⑱符霖:《禽海石》,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8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861页。原书1906年由上海群学社出版。

③⑲苏德蒙:《卖国奴》,吴棣译,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26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357页。

On the Phenomenon of "Two Languages" of Chinese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Langua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Gao Yu

Abstract: Both the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were commonly used at the en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hereas the classical Chinese was in the dominant position, vernacular wa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there were many intermediate forms between classical and vernacular Chinese, such as half-classical and half-vernacular, and virtual classical Chinese, that is,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is the deep foundation of thought. Classical Chinese is particularly suitable for expressi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while the "national language" can express modern thought accurately and effectively. The "two languages" of Chinese is both the phenomenon of and reason for the active modern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its development reflect th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after the Song Dynasty.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the Chinese language tended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vernacular-based, supplemented by classical Chinese, and eventually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ancient Chinese to modern Chinese.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as very complex in structure, and the vernacular and the literary language coexisted, conflicting and harmonizing and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The "chaos" on the surface was in fact a manifestation of plurality, inclusiveness, tension, abundance, complexity, vitality, and a variety of possibilities, and the "chaos" was the deeper reason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vitality of the society in this period.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classical Chinese; vernacular Chinese; modern Chinese